



又信道，讲究清净无为。道教崇尚自然，玄青之色近于道，一抹天青，恰好安放了北宋末年那个朝代的向往。

汝窑的鼎盛前后不过二十年。靖康之变后，窑毁技绝，天青成了绝响。它像一朵只开二十年的花，盛开即凋，凋谢即成传说。如今全球公认的传世汝窑器不足百件，乾隆诗中“晨星真可贵”五个字，说的正是这份稀少。收藏界有句老话：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如汝窑一件。”2017年，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洗，二十多分钟里被叫价近三十次，最终以2.943亿港元成交，创下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。

其实早在南宋，汝瓷就已身价惊人，《武林旧事》记高宗到清河郡王张俊家做客，张俊一次便献上十六件汝瓷。方文山为周杰伦作词的那首传遍街巷的《青花瓷》有“天青色等烟雨”一句，不少资料指出等的其实也不是青花，而是这抹千年前的汝窑天青。

含蓄简淡中的宋代审美

热闹不是宋瓷的追求，内敛与含蓄才是。宋代五大窑，五种脾气，却都收敛在一道釉色、一条弧线里。各据一方的林立窑口，却共享同一种气质：无论官窑民窑，都收敛、都克制，都不以繁复取悦人。这是整个时代的审美共识，不是某座窑炉的偶然。

往前看，唐代的审美是浓烈的。唐三彩黄绿褐白，斑驳得像一场狂欢。金银器流光溢彩，把富贵写在了脸上。宋人却像突然按下了暂停键，把浮华一层层剥掉，只留下最素净的东西。

这种转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：宋代崇文抑武，文人趣味因而成为主流审美。理学兴起，“格物致知”让士大夫习惯于从万物中求索道理，也把一种内省的气质注入审美。苏轼在《与侄书》中论文章艺术曾说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，宋瓷正是这句论断落在器物上的注脚。

宋人的审美是相通的，含蓄、留白在宋代被普遍视为高级的表达方式。山水画里，马远、夏圭爱画一角一隅，大片留白，天高地远。宋瓷同样以“少”取胜，一件器物，往往只有一道釉色、一条弧线。宋徽宗办画院，出的题目常是一句诗，比如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，画家不画花，

只画一只蝴蝶追着马蹄飞。懂了这种含蓄，也就懂了宋瓷。

但极简绝不等于简单。宋瓷看似素面朝天，线条、比例、釉色却一丝不苟，对工艺的要求很高，稍有差池即为废品。釉色越单一，越考验配方和烧成控制。它把功夫藏了起来，只留一个从容的外表，正如苏轼评陶渊明诗所言，“外枯而中膏，似澹而实美”，表面枯淡，内里丰腴。这种美不靠堆砌，而靠分寸，不靠抢眼，而靠耐看。

宋代的器物从青铜礼器手中接过盛器的位置，却消解了青铜那种凝重的神秘感，让器物走下神坛，其更接近日常使用。器物不抢人的风头，颜色不刺人的眼，日常的点缀恰到好处，多一分则闹，少一分则寡。这种内敛不是压抑，而是一种自信，自信到不需要用繁复来证明自己。

宋人把器物称作“案头清供”，意思是摆在案头、可供赏玩的物件。文人书房里的砚台、笔洗、香炉，



南宋龙泉窑青釉堆塑蟠龙莲瓣纹盖瓶。摄影/张坚军